

## 第五辑 序

人是从“略识之无”开始学习“阅读”的，但很可能十几年、几十年下来，还未必能真正“阅读”。有时虽然读得欢畅，自己以为“阅读”已经上路，可是同有些内行大家一比，却还矮了一截。此研究“阅读”的必要性之所在。至于西方现代理论家之看重“阅读”，认为它可以表呈潜意识，可以重估思想史，可借以理解人类主体的表意过程等等，自然立意更加高明，只是为文深奥费解，“阅读”此类理论已为我辈所不能，何况用这理论来指导“阅读”，只能表过不提。

看起来，中国的读书界对“阅读”问题的探讨兴趣逐步抬头，这可能是读书札记、学术小品之类畅销的一个原因。若然，真是中国出版界的一大幸事。因为，要让正儿八经的出版业真正繁荣，除了管理层面的适当“松绑”，让出版者和读者有较多选择权，更重要的，是仰仗读者们“阅读”能力的提高，学会使用“选择权”。前面一个问题，已经嚷嚷多年，什么“读书无禁区”，什么“□必须四门大开”等等，在前贤先人、高明主管的努力下，可谓已经大著成效。一年出书十来万种，尽管其中还是问题重重，但毕竟琳琅满目，一走进书店，同过去满壁凄凉不可相比。可是后一问题，似乎还得努力。如果书店的大多数主顾们不容易被诓骗，大多读书的人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则何愁优良读物没人赏识，也不必担心低劣读物会占领市场了！

一念及此，又激起我们再编几册《书趣文丛》的勇气。因为环顾书市，虽然同类出版物不少，仍然有不少“阅读”大家“漏网”。而就中国近代“阅读”史来看，这些位大家是不能不令人注意的。从大家名作中学习“阅读”，可能比研讨符号学、

解构学之类阅读理论更容易措手，更易为人接受。时下同类的丛书已有十多种，有些更以“一网打尽”为职志。无论就事业就商业言，我辈大可就此退隐，另觅谋生或不谋生之途。但从补苴的角度说，似乎还有可为。因为凡事如欲“一网打尽”，必然有所子遗，从而可以让一些小编辑来作补苴罅漏的营生，各尽其能，却也相得。何况从这里所选十位大家的名作可以看出，以中国之大，“一网打尽”委实不易。

讲到这里，似乎还可交待一句：《书趣文丛》产生的原委之一，其实就在补苴罅漏。人们误传它是同类丛书的始作俑者。大误。在它之前，已有有关的著名丛书。只是一时之间，有关的丛书容纳不了如许选题，不能不压缩范围。一时斫下十来个题目，而编辑手边已经有稿，又正好在有的刊物中出现了读书有趣或无趣的讨论，于是只能“分流”。“分流”也者，其实也可叫“嫁祸”，因为所以斫下选题，只是为了害怕亏本（当时也确实亏不起）。将不肖的“赔钱货”远嫁关外，配流他乡，隔不多时，流外之物居然成材，而且蒙名流大家赏识，得以持续出版至第五辑，实为始料未及。然而归根结柢，还得感念关内关外的诸多公婆，耐心帮助抚育。编撰中国出版史的衮衮诸公，大可以此事为中国出版“全国一盘棋”以至兴旺发达的一个注脚。一笑！

脉望

1997年10月

品 目  
评  
录 录

- 1 自 序  
**胡 适**
- 4 胡适论
- 14 什么是世界文化的危机
- 31 新文化运动的根、枝叶和所需要的阳光
- 39 制宪不如散会
- 46 “理未易明”么
- 49 唯心主义是科学的敌人  
**蔡元培**
- 71 争民主的战士永生
- 75 纪念蔡元培先生  
**李大钊**
- 80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李大钊  
**瞿秋白**
- 86 读秋白遗文
- 93 对瞿秋白最好的纪念  
**鲁 迅**
- 99 学习鲁迅的文体
- 101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 106 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  
**郭沫若**

- 124 毕生奉献于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人  
**邹韬奋**
- 134 韬奋先生的道路
- 136 邹韬奋同志一生的工作和斗争
- 149 一个在人民中间的人
- 152 追求真理的坚强斗士
- 157 追念邹韬奋同志
- 161 一位革命知识分子的选择  
**胡愈之**
- 167 胡愈之同志的工作精神  
**侯外庐**
- 172 怀念侯外庐同志  
**吕叔湘**
- 177 我所尊敬的学者和师长  
**顾颉刚**
- 179 纪念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  
**罗尔纲**
- 184 祝贺时的感想  
**艾思奇**
- 187 艾思奇走出的第一步  
**柳 湜**
- 192 写在《柳湜文集》的后面  
**叶籁士**
- 197 叶籁士和世界语  
**徐 沫**
- 202 忆何增禧（徐沫）  
**田家英**
- 207 忆家英同志二三事

## **胡乔木**

212 我党理论宣传工作的卓越领导人

215 胡乔木和党史工作

## **陈 云**

225 实事求是的典范

## **周恩来**

231 维护党的团结的楷模

238 周恩来和南方局文委

## **毛泽东**

248 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

264 对《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的几点说明

# 自 序

收集在这本小书中的一共有三十八篇文章，其中有一小部分是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写的。最早的一篇甚至是发表于抗日战争前夕。

一九五五年在号召对胡适的声讨和大批判中，有人找出我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写的《胡适论》给我看。当然是很幼稚，但说得似乎还比较公道，照顾到了各个方面。但文章和当时大批判的基调显然不合。其实抗日战争中的一九四四年和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一九四六年八月我还写过两篇关于胡适的文章，文中甚至对他表示敬意和希望。到了一九四六年底，国民党当权派破坏国内和平，不惜挑起内战的决心昭然若揭，而胡适的政治态度也已十分明显的时候，我才在上海出版的《文萃》周刊（这个刊物终于被查禁了，编者被枪杀）中进行了狠狠的打击，这打击我以为还是讲道理的。在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适中，我写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收在这个集子中了）。这篇文章固然不免带有当时的痕迹，但我以为还不是戴几顶空帽子而是讲道理的。把这几篇前后相距十八年的不同时候写的文章集在一起，似乎也还有趣。

胡适是近代中国思想史、政治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个人。他一生有过复杂的经历，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而又有许多矛盾，有独立与不独立的矛盾，这面与那面的矛盾，前与后的矛盾，思想与行动的矛盾。这些矛盾之产生有他个人

的因素，而又深深印着时代的烙痕。在我的这几篇写于不同时候的文章中，读者可能会感到有些话互相抵牾，但我以为这都是合于事实，可以理解的。我在这里并不是有系统地全面地对其人的一生盖棺论定，所以把这几篇文章，一切照旧，丝毫不改（甚至有些三十年代用的语词也不改）保留在这里。

这个集子中关于鲁迅的三篇文章都是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作品。其中最后一篇是在一九四八年写于香港。那时，我和参与《大众文艺丛刊》的几个朋友（邵荃麟、冯乃超、乔冠华等）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觉得不能同意，其中也涉及对鲁迅一生的评价，所以我写了这篇文章。文章拖了一个小尾巴，提到胡风。当时，我们都和胡风熟识，意见不同似乎并未损害友谊，论争也并没有展开。多年来，朋友们认为我的这篇论鲁迅的文章还有些中肯之处，既然保留，那条小尾巴也不便割掉了。

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作品编入本集中的还有关于蔡元培的两篇中的第一篇，关于瞿秋白的两篇中的第一篇，关于邹韬奋的六篇中的前一篇。除这些以外的三十一篇，大部分是在一九九〇年左右几年间写的。

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四年我在北京大学（那时还是在沙滩红楼）做学生时，胡适是文学学院院长。但没有他的课，也没有机会见到他。因此，这个集子中，排在最初的五位先生（即胡适、蔡元培、李大钊、瞿秋白、鲁迅）都是我无缘识荆的。自郭沫若、邹韬奋直至周恩来、毛泽东（按这个集子中排列次序说）都是我直接接触过的党的领导人和学术文化界的前辈以及有深交的朋友。或因为有祝贺的机会，更多由于追悼、怀念，写下了这些篇什。历年来写过的类似文章还有不少，选录这一些，因为字里行间，还算是作了些如实的品评，当然不敢说是全面周到的评论。至于像毛泽东、周恩来这样伟大的历史人物，我更只能是略窥其云中之一鳞半甲而已。

在一九九四年，我出过一本文集，叫《先贤和故友》。其中有十五篇收入本书。这十五篇在这个集子中占八十余页，为全部篇幅中的三分之一弱。因为现在很多读者们对于不同的书名中重复文章太多很不满意，所以我在这里交代一下。

最后，似乎还应交代一下这本书里的文章为什么这样排列。确实，为找出排列的次序是费了一点心思。但这样排列也说不出多少道理。只好借用报纸广告中常可见到的一句话：“排名不分先后”。

胡 绳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 胡适论

——对于胡适的思想方法及其  
实际应用之一考察

### — 引

五四运动是中国的布尔乔亚在历史上的一幕最精采的演出，在这一个运动中间它养成了它在思想上的代表人物——胡适便是这中间的最不会被人忘记的一个。

但是中国的历史过得太快了，五四运动到现在不过二十年，在当时激烈地打过一番“硬仗”的战士，虽然大半都还健在，却已经在时代的背景前经过不止一次的蜕化，在今日的进步的青年的眼前都已经成了模糊的影子了。单以胡适而论，他的向溥仪跪拜的故事，他的“中国的五大仇敌”的说法，他的“好人政府”的主张，他对于李顿报告团的歌颂，他在两广异动、陕西事变中发表的言论……这些都使他在历史的实践上成为退掉颜色的人物。“胡适”两个字，在现在已被看做是保守的、中庸主义的、绅士派的学者的代名词了。

但是我们绝不应该把胡适看做一匹“死狗”，甚至也不能只把他看做“历史的人物”，对于他在“五四”时的功绩称颂一下就算了事。假如我们不否认在即将爆发的中国的民族解放的抗战中间，布尔乔亚也可以有它的一个哨岗的话，那么对于为其思想上的代表者的胡适以及其他的人，我们都不能不求更多的理解，再作一次估价。

老实说，对于我们的新文化的启蒙的思想者，我们所知道的实在太少了，我们所曾做过的，几乎只是抹煞和颂赞。譬如对于胡适，有人说：这是中国最好的思想家，是新文化的创始

者，这样地颂赞一番就完了；有人说：这是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的、买办的布尔乔亚的意识形态的代表者，这样地一笔抹煞，也不加以更多的申述了。

在这里，我想对于胡适做一番新的考察。但我们并不打算把他的文化活动上的成绩全部细细检查一下（这工作虽已有人做过，但也等于没有做，是应该有人重新做一下的），我所要做的，主要的是在于：从当前的实践的立场上，对于贯彻在胡适的全部活动中间的他的基本的思想方法，做一个新的认识，新的估计。

## 二 先天的软体动物

在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上，布尔乔亚伴随了它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胜利，一定还得彻底地争取思想上的胜利。十七、十八世纪是欧洲各国的布尔乔亚抬头的时期。在这时期，在荷兰出现了斯宾诺沙；在法国出现了笛卡儿、加桑地以及十八世纪的百科全书派的光辉的唯物论者；在英国出现了培根、霍布士、洛克，他们都以不同程度的战斗的姿态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反抗教会的独断论，而建立或较隐晦，或明显的唯物论的思想体系。在他们的手里的最有力的武器是理性主义，是实证的自然科学。他们用理性战胜了中世纪的迷信和盲从，用自然科学战胜了宗教的信仰。

理性主义和实证的自然科学也正是中国的五四运动的大旗上面的标志。胡适曾提倡过一种“有意思的生活”，他说：“畜生的生活只是糊涂，只是胡混，只是不晓得自己为什么如此做。一个人做的事应该件件事问得一个‘为什么’。”（《胡适文存》一集第4卷）这正是叫人过理性的生活，对于一切事情都要根据理性追究一个“为什么”的道理。至于实证的自然科学的提

倡，那更是在胡适的文章中到处找得到的。譬如他说：他所提倡的“新人生观是建筑在二三百年的科学常识之上的一个大假设”，且说：“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科学与人生观》序，《文存》二集第2卷，重点原有）

这两种态度岂不都是代表了布尔乔亚的进步的方面的么？理性主义的生活正是对于传统的礼教、盲从的习俗的一个有力的反攻。科学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在反抗玄学的、命运论的人生观时，其进步的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

但是我们不能过分夸大了胡适的思想中的进步的方面。拿他（以及他的同伴们）的思想和英法的启蒙思想者的一比较，我们不能不替我们的启蒙思想者惭愧了。在向上时期的西方的布尔乔亚靠了理性和自然科学的帮助，建立了一个在神的力量以外的完整的宇宙观，达到了彻底的无神论和机械唯物论，他们和一切传统的偏见对立，勇敢地相信着真理是在自己的手里。但是我们的布尔乔亚呢？他们在历史的向上时期只是“昙花一现”，随后就俯身在帝国主义的铁蹄和金元英镑的势力之下，甚至为了维持自己的存在，和封建的势力相结合，而成为柔软的、卑屈的存在了。因此，胡适思想的弱点也紧紧伴随着他的进步的所在而来了。

十七世纪的欧洲的理性主义的哲学家主张从理性中间可以得到真理，笛卡儿虽然从怀疑开始，但他对于数学的方法本身毫不怀疑；斯宾诺沙更进一步说：人类的理性能够渗透宇宙的本体，得到客观事物的真理。但是我们的启蒙思想者——胡适却没有这种鲜明的唯物论的认识论。首先，他并不以为他能把握到真理，即使他的科学的人生观也不过是一个“大假设”而

已。他还明白地说：“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的”（《文存》一集第2卷）。拿这样的话和斯宾诺沙所说的“观念之秩序和联络，与事物之联络和秩序相同”（《伦理学》）一比较，岂不是有着太大的差别么？照后者，真理应该是和客观的事物相照应的；照前者，真理便只是人类为便利而随手造出来的罢了！因此胡适对于他自己所信仰的是否真理是并无把握的，譬如他虽然自称为“无神论者”，但是却又说：“我们的信仰是根据于证据的：等到有神论的证据充足时，我们再改信有神论，也还不迟”（《科学与人生观》序）。好聪明的说法啊！相形之下，坚决地和教会作战的斯宾诺沙以及法国的百科全书派都是太傻的人了！

而且，和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思想家相反，胡适常常回避许多世界观中的根本问题。譬如他对于“人类未曾运思以前，一切哲理有无物观的存在”的问题，认为“简直是废话”，是“不成问题的争论”（《文存》一集第2卷）。又如他说：“灵魂不灭的问题，于人生行为上实在没有什么重大影响；既没有实际的影响，简直可说是不成问题了”（《文存》一集第4卷）。可怜他虽然自认为有了科学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却又不得不说，他只“注重在具体的事实与问题，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文存》二集第3卷）。连灵魂是否不灭这样的问题也只好“存而不论了”！反看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把宇宙的一切看成一个有机地联系着的整体，从任何一个角落里把观念论的、有神论的思想赶逐出去。我们真不能不说：我们的启蒙思想者真是先天的软体动物！

胡适虽然在反旧礼教、反文言文、反“精神文明”的时候，显出了战斗的光芒，但是在他的思想的本质上已经包含着脆弱

性和不彻底性了，这些就注定了他在思想和实践上表现出来的落后。譬如他的“整理国故”，虽然他自称是“捉妖打鬼”，是在试用他的新方法，可是难道古书的版本字句的考订成了比“灵魂灭不灭的问题”，对于“人生行为”反而有较重大的影响么？

然而这种脆弱性和不彻底性不是胡适个人的责任，中国的新兴的布尔乔亚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都患着显著的软体病，这真是个历史的悲剧！

### 三 树木和森林

中国的布尔乔亚在历史上占到个大便宜，那便是：西方的布尔乔亚在三四百年苦苦建立起来的文化可以让他们自由地选取。帝国主义的大炮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的“文明”、科学、“自由平等”的思想。在欧洲，经过了十六、十七世纪的许多哲学家科学家的不顾生死的奋斗，科学和哲学才脱离了宗教的泥沼而独立。可是二十世纪的中国布尔乔亚只要乘总统号大轮船向外洋去一趟，就把这一切带回来了。胡适口口声声地颂赞西方的近代文明，决不是没有理由的。可是他不知道：也正是帝国主义的大炮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国家，使中国的新兴的布尔乔亚不能挺直它的腰干，使作为它的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们不能达到像十七、十八世纪的西方思想家们那样的战斗的姿态！

而且在中国的思想家去到欧、美的时候，西方的布尔乔亚的思想家也早已和他们的伟大的启蒙者们永远地诀别了，因为这时代的西方布尔乔亚已经不是历史上的向上的阶层，而是一步步向下，走向没落的命运中去了。胡适到美国去搬运来的皮耳生、詹姆士、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正是没落的布尔乔亚的思想的一支派。他们也放弃了对于宇宙的根本问题的解决，只从

对于自己目前有用与否的标准来验证一切事理，也放弃了对于客观真理的追求，甚至重复投身到宗教的泥沼中去了（如詹姆士说“如果‘上帝’那个假设有满意的功用，那假设便是真的”）。这一切特征岂不都是照式照样地表现到胡适的思想中了么？先天软弱的东方布尔乔亚和后天衰老的西方布尔乔亚拜把子，这可算是一幕历史的趣剧！

十九世纪以来的西方没落阶层的思想，比较他们的前辈的，不但是动摇不定，而且也狭窄得多了，他们只是把目光集中在局部的、零碎的问题上，探求“较满意”的解答。这种态度也是非常适合于半殖民地的新兴的布尔乔亚的。胡适所说的“多说问题，少说主义”，正是这种态度的具体表现。

胡适在一九二〇年写过一篇《问题与主义》，里面说：“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纠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洋洋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吧，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文存》一集第2卷）这篇文章在当时已受到很多驳难，可是反驳的人说的话，实在有些是难使胡适心服的。事实上，在那时的思想界中空谈主义而不切实际之病确是有的，但是真正是正确的“主义”本不是空洞的“理想”，而应该是密切地和每一个实践的问题相结合着的：它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理论上的原则。一切个别的问题不是杂乱无章地出现的，而是在其内部有着必然的联结，这种必然的联结就反映在“主义”上面。但胡适的思想方法却全然与此相反，他所看见的只是一个零碎的、枝节的问题，这正叫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在一九三五年的《独立评论》还有过一次很有趣的讨论。

胡适说：“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就在于大家滥用抽象名词，譬如“胡适打骈文古文就是打封建主义”。这话就不对，因为在胡适看来，打骈文古文就是打骈文古文，打缠小脚就是打缠小脚，打“孔家店”就是打“孔家店”……并没有什么打“封建主义”这回事。同样，他也不赞成“帝国主义”啊，“资本主义”啊……这种种说法。显然这决不只是一个“用名”的问题，这实在是表现了实用主义的思想方法的。他的这种思想方法就决定了他的实践的不彻底，他在打倒了缠小脚，打倒了骈文古文之后便“得意扬扬”，却不知道“封建主义”那个东西（这难道只是个抽象名词么？）又用着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了。“一点一滴的改良”终于是一点一滴的失败！

用了这样的思想方法，胡适无论在什么场合所看见的都是孤立的事物、局部的问题、表面的现象，他看不见在个别之间的联系，看不见横在现象里面的本质。因此他在美国只看见“平均每五人有一辆汽车”的含混的统计，只看见穿晚餐礼服的“劳工代表”（《文存》三集第1卷），在国内也只看见鸦片、八股、小脚，只看见“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是我们的“五大仇敌”（《新月》2卷10号，《独立评论》18号）。近年来，他对国内政治所发表的一些引起人反感的意见也和他的根本的思想方法有关系。譬如他在两广、陕西的事变中都竭力主张“明令讨伐”，这是因为他虽然看到了全国的统一的需要，可是忽视了统一与和平是不可分地联系着的。两项事变都和平地解决了，这对于实用主义者的胡适应该是极好的教训吧？

夸大了一点，忘却了其余的一切，这是实用主义的思想方法的根本弱点——一个手指横在眼睛前面，也会遮住对于整个平原的展望的啊！

#### 四 新的认识 新的觉悟

以上，我们已经极粗疏地说明了胡适所负着的进步的思想及弱点了，然而正如我们不应当过分夸大他的思想中的进步处，我们也不应当过分夸大他的缺点。胡适不能达到我们的唯物论，更不用谈动的逻辑，这都是很显然的，可是虽是这样，我们也应该承认，在他的错误的思想方法中也有着合理的成分。

中国的布尔乔亚虽然在“昙花一现”之后，就没有了气力，可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的进攻之下，在全民族的救亡运动的高潮的刺激之下，他们不能不得到一点新的觉悟、新的认识。近年来，胡适曾几次地被现实情势所逼迫，不得不承认他对于《塘沽协定》，对于华北局势估计的错误，终于在去年年底在太平洋学会中说出了“日本的最后目标显然是要在政治上完全控制中国”这样明白的断语。并且大概因为在国外看到了各国舆论对中国解放运动的态度，回国后在上海演讲说：“日、德、意几个侵略者已经合在一起，中国只有加入英、美、法、苏几个民主国家的阵线。”这些言论，都可算是我上面所说的“新的觉悟、新的认识”的反映。

我们应该宝贵这种新的觉悟、新的认识！

前面我曾说，胡适的思想方法是贩运来的西方的没落的布尔乔亚的哲学，这确是可悲的事实。但是我们也得注意，在胡适的书里的实用主义是用来打击封建的宗法社会的传统的，而在杜威、詹姆士的手里，它除了是哲学和科学的堕落以外再没有别的意义。二者之间多少是有点不同的。靠了实用主义的训练，胡适至少得到了这样两点我们至今不能全盘抹煞的好处：第一，他能拿紧此时此地，虽然他也正因此而常常忽视了远处和将来，但是比了全然在梦想中过日子的人是较为清醒的，比了只是用漂亮的空谈装饰自己的人也是更可爱的。譬如他要反对“独爱的个人主义”的新村，他说：“我们的新村就在我们自

己的旧村里！我们所要的新村是要我们自己的旧村变成的新村！”“我们放着这个恶浊的旧村，有什么面孔，有什么良心，去寻那‘和平幸福’的新村生活！”（《文存》一集第4卷）固然他不能知道“旧村”的“恶浊”的根本原因，而他所提出的改革的方法也只是“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可是就在这改良主义中也未始不含着现实主义的成分。第二，实用主义的方法常常使他看不到事实的全体和真相，但也使他知道要“尊重事实”，因此，在事实逼紧了他的时候，他还不至于完全抹煞事实而不顾。像在一九二六年他到过苏联，他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甚是恨事。但我所见已足使我心悦诚服地承认这是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大政治试验。……”（《文存》三集第1卷）固然他始终看不出苏联和美国的根本不同是什么，可是他自己说：“我的实验主义……不容我以耳为目，附和传统与狭窄的见成”（同上）。也正因为他能尊重事实，他才能在太平洋学会中和回来后发表如前所节录的话。一个能知道尊重事实的学者还是比较有望的，尽管有时因此他不得不成为现状的妥协者，可是在目前，很显然地，谁能“尊重”民族的危机的“事实”，谁就不能不或急或缓地用各种方式加入为民族的自由与解放的抗争。——在汉奸和战士之间的妥协的路是一天天地狭窄而终于会消失的！

尽管胡适近年来发表过许多离奇甚至荒谬的议论，尽管他被有些人骂得一钱不值，可是他在读者群中还是占有相当力量。他在《独立评论》的四周年纪念号（一九三六年五月）中说他这刊物在一年中从七千读者增加到一点三万读者，这个数目字在中国目前的出版界中已是不容轻视的了。他说他的刊物的特色是：“我们不说时髦话，不唱时髦的调子，只要人撇开成见看看事实，因为我们深信只有事实能给我们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们独立”；又说：“我们不作刺激性的文字，不供给‘低级趣